

编者按

不久前,清华大学在校内施工现场发现一片古墓的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古墓派”高校也由此又多了一位成员。

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大地上,古迹文物数不胜数,在校园内发现历代文明遗迹的事并不罕见。此次清华发掘出的古墓尚属贫民墓葬,并没有太多文物,但环顾国内其他高校,源自于校园内的“宝贝”却也不少。本报特地选取几件校园“宝贝”,为您讲述属于它们的故事。



四面佛唐石塔幢  
发现高校:西北大学

在清华发现古墓的报道见诸媒体后,曾有西安高校的网友打趣道:“对于这件事,西安高校只是看着不说话。”此言虽属戏谑,但也足见西安高校校内古迹文物之丰富。其中的一个代表便是发现自西北大学的“四面佛唐石塔幢”。

时间回到1988年。这一年的秋天,西北大学为了解决教职工所居住的“西大新村”的取暖问题,要将教学区的暖气管道输送至新村。一天下午,该校文博学院的一位老师在施工工地路过时,正好看到几位民工费力地将一块石头从沟槽里拉出,这位老师凑过去看时,感觉这块周身是泥的石头有些不同寻常,依稀能分辨出佛像的模样。于是,他请民工将石头拉到附近的水龙头处冲洗,一件十分精美的四面佛石塔幢就这样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塔幢即经幢,原是中国古代仪仗中的旌幡,是在竿上加缀织物做成,又称幡幢。佛教传入我国后,人们开始将佛经或佛书写在丝绸的幡上,后来为了永久保存,改为刻在石柱上,因刻的主要是《陀罗尼经》,故称为经幢。据文献记载,在唐代,西北大学所在地为著名寺院——实际寺。此地也出土过一些该寺文物,这尊石塔幢也属其中。只不过,它是实际寺出土文物中最精彩的一件。

根据测量,塔幢主体为长方体,四面各有一个佛龛,下有仰莲座,上下两部分都有榫卯结构。之所以称其为“四面佛石塔幢”,是因为该塔幢的四面都供奉着密宗诸佛。东面为金刚界曼荼罗内阿闍佛,其代表了大圆镜智,亦名金刚智;南面为宝生佛,它是密教中金刚界玉智如来的南方如来,代表大日如来五智中的平等性智;西面佛像作善跏趺于天衣座上,两脚自然下垂,各踏一莲花,偏袒右肩,其形象与洛阳龙门石窟中奉先寺大佛绝相似,接力位为阿弥陀佛;北面为金刚界曼荼罗无量寿佛,号大悲金刚,波发高髻,垂肩大衣,双手用作法界定印,跏趺坐于垂障的须弥莲花座上。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塔幢的佛龛两面,分别饰有特别的鲜花和供养人像,这些人像面庞丰腴,仪态安详,阴刻线条,刀法自然流畅,而且与武则天的相貌十分相似。相传,实际寺中有吴道子的画作,这样精美的线条也很可能为其所作。

据文献记载,女皇武则天曾将其2万贯胭脂钱捐出来,用以修建洛阳龙门石窟中最大的一尊佛像——卢舍那大佛。四面佛塔幢的佛像形象与洛阳龙门奉先寺的大佛完全一样。究其原因,奉诏检修卢舍那大佛的工匠就是实际寺的主持善导法师,这就不奇怪了,因为它的总设计师和检修官都是一个人,这么大的工程,善导法师首先要到实际寺作画稿,雕凿样本,才能交与女皇武则天查验通过。

如今,这座珍贵的四面佛石塔幢依然在西北大学博物馆展出,并已经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西汉张汤墓  
发现高校:西北政法大学

一件珍贵文物被世人发现,往往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这样的“机缘巧合”在文物发掘的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尽管如此,有些文物与发现地之间的“缘分”,依然让人啧啧称奇,这其中就包括发掘于西北政法大学的张汤墓。

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西汉历史有些了解的人,都不会对“张汤”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作为西汉武帝时期的重臣,张汤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名执法严苛、刑讯逼供的“酷吏”。在许多人“非好即坏”的历史评价尺度下,张汤给人的印象自然是不好的。然而事实上,张汤是汉代立法司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他不仅遵旨办案、依律断案,审理过陈皇后巫蛊案,淮南王、衡山王等重大谋反案件,更重要的是,张汤通过修订法律,行经断狱,对我国古代的法治做出了重要贡献。《晋书·刑法志》曾载,张汤撰《越宫律》27篇,另一位大臣赵禹撰《朝律》6篇,与汉初萧何撰《九章律》9篇、叔孙通撰《傍章律》18篇,合称“汉律60篇”,汉代律典之基本风貌至此成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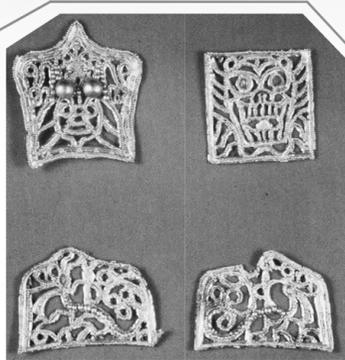
公元前116年,御史大夫张汤遭同僚陷害获罪,自杀身亡。这位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其职位要大于现今的最高司法长官,但他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均是皇上所赐,下葬于荒郊贫民墓区,也是薄葬,“载以牛车,有棺无槨”,这被后来张汤墓考古发掘报告所证实,其廉吏风范足为后世楷模。

如今,时间过去了两千余年。2000年,“西部大学城”在长安兴建,西安市内高校先后迁入大学城。西安邮电大学便在无意间,将新校址定在了张汤墓的所在地,然而此后,因为该校需要一个南北长的校址,便将此东西长的地界调换给西北政法大学。

历史是否有冥冥之中安排,对张汤有所眷顾,让蒙冤而死的这位西汉时期重要而有争议的政治法律人物为一座现代化政法大学的建设所“唤醒”——2002年,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基建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进行了考古发掘,张汤墓遂重现天日。

据考古报告称,该墓葬是斜坡墓道土洞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随葬品多为日常生活中的小件,不见汉墓中常见的陶器和其他贵重器物。最为珍贵的是两枚极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张君信印”;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墓中发掘结果印证了《史记》《汉书》中关于张汤的多项记载。

2008年,西北政法大学在校内建造了具有汉代风格的“张汤墓考古发掘纪念馆”“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遗址陈列馆”和纪念亭——“廉亭”。该校学生也以此为豪,自发组织了志愿者队伍,为每周定期开放的陈列馆服务,为那些慕名而来的参观者提供讲解服务。在一所现代化的政法大学校园里发现古代廉吏墓葬并建“廉亭”,弘扬廉洁文化,意义极为深远。政事兴亡,惟廉弥珍!



东晋金冠饰  
发现高校:南京大学

除去西安,号称“六朝古都”的南京,同样是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沉淀的城市,身处其中的高校,拥有众多校内古迹文物者,同样并不少见。

比如在南京大学,其校内博物馆所具有收藏历史,便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南京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文学院和史学系以及图书馆便开始收集收藏殷墟甲骨、金石拓本和名人书法等文物。

建国后,两次偶然的发现,又让南京大学的博物馆中,拥有了一批珍贵的文物藏品。

先是在1954年,南京大学计划在当地的北阴阳营一带建造一批校舍。就在施工期间,工人们在该地区发现了大量石器。直到如今,北阴阳营遗址依然还是明朝南京城城区范围内,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十几年后的1972年底,南京大学根据指示要在校园内挖掘防空洞。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当施工人员挖到该校北大楼附近时,竟意外地再次挖出了一处东晋古墓。随即,考古人员对这座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根据测量,这是一座方向为南偏西的双室墓,由墓门、甬道、主室、侧室甬道、侧室等部分构成。古墓封门墙以内的甬道内设有两道门槽,这显示其曾有甬道门,这种设置方法常见于六朝帝陵中。

在这座大墓中,考古人员发掘了一大批青瓷器,此外还有一些陶器和金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在墓中还发现了一组造型精美的金冠饰。当时,类似的文物珍品举国罕见,但在这个东晋古墓中,却一下出土了4件,让人称奇。

这组金冠饰全部由粟粒状小金珠在金丝上焊接而成,制作得极其精美、考究。四件器物分别为一件山形蝉纹金玕、一件方形兽面纹金冠饰,以及两件山形神人乘龙纹金冠饰。

这其中,金玕源于胡服,近代注明学者王国维曾释曰:“玕者,当也。当冠之前,犹瓦当之当瓦之前矣。”金玕呈山形并以蝉为饰,应是在传入中原后,受汉宫服饰影响的结果。

一般而言,古人之冠是需要由四片金饰装饰的,并将其分别饰于冠的前后左右。在这四件金冠饰中,山形蝉纹金玕饰于冠前部,方形兽面纹金冠饰于冠的后部,两件山形神人乘龙纹金冠饰则饰于冠的左右两侧。

目前,这组珍贵的金冠饰依然被珍藏在南京大学博物馆。博物馆为它们,以及其他源自于东晋大墓的出土文物单独开设了展区,供师生与游客观赏。



明故宫太庙古井  
发现高校: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提到南京,一个朝代便不能不提,那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全国性汉族政权——明朝。

600年前,一代枭雄朱元璋在南京城建号称帝,从此君临天下。600年后,那段金戈铁马的历史早已尘封,但一座现代化的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却在明故宫遗址上,为祖国培养了一代代航空航天人才。

漫步南航明故宫校区的综合楼附近,总会给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充满现代气息的教学楼、高大的梧桐和绿地,而过道两边却排布着饱经风霜的石柱底座的大石墩,这些都是明故宫太庙的遗迹。在南航明故宫校区,类似地表之上的遗迹还有许多,其中就包括一口修建于明朝的太庙井。

太庙是古时皇帝祭祀祖宗的建筑。位于南航校园的这口太庙井发现于2003年。该井直径2.05米,深2.08米;井壁由楔形青砖错缝砌成,壁面安装有可供攀爬的铁环;井底有泉眼,有方砖覆盖其上。据考证,此乃明太庙古井,也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的直径最大的古井。

在对古井遗址进行发掘时,考古人员清理出包括木桩、青花瓷片、青石雕护栏在内等一批珍贵文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文物中有件龙泉青瓷罐,印证了除景德镇瓷器外又一大官瓷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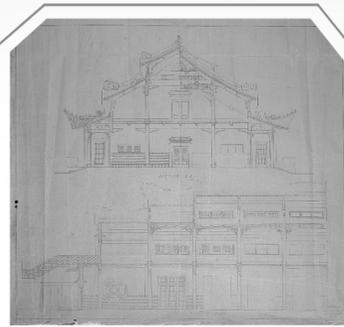
这只从古井内淤泥和建筑垃圾中清理出的瓷罐完整无损,制作精美,瓷表面有特殊烧结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完美呈现了龙泉瓷罐的鲜明艺术特征。此外,由于该瓷罐出土于明太庙古井中,被专家确定为明代皇家祭器,很好地佐证了此前考古学家对龙泉青瓷曾经为明朝早期宫廷和中央政府生产官方用瓷的推断。

据对此进行过专门考证的南航教授昂海松介绍,此前,在浙江龙泉考古现场发掘出的瓷器上刻有五爪龙纹、“官”字样,经过专家讨论,当时初步认为龙泉青瓷曾经为明朝早期宫廷和中央政府生产官方用瓷,但并无其它佐证,而南航明太庙古井出土的这件龙泉瓷罐恰好印证了专家此前的推断。

除龙泉瓷罐外,井内还出土了不少显示皇家建筑特征的黄色琉璃构件残块。井中还有不少发黑的建筑构件,有火烧后的痕迹。

对此,昂海松在其著作中谈道:“我从《明史》记载中找到相关出处:永乐十八年北京宫殿建成,次年朱棣迁都北京,此后明故宫日趋冷落,自然损坏非常严重。嘉靖十三年六月甲子,南京太庙火,毁前后殿、东西庑、神厨、庖厨”。这次火灾直接烧毁了明太庙的主要建筑。嘉靖皇帝在北京召群臣集议,决定不再修复南京太庙,而是直接将烧过的太庙遗址筑墙封闭了事。因而,古井成为各种建筑构件堆积处之一。”

不论古井中为何会有如此多的文物残块,又为何会出土如此完整的龙泉瓷罐,这座静静沉睡的古井都将继续见证南航的成长与发展,无声地讲述明朝的那些事儿。



武大建校图纸  
发现高校:武汉大学

在距离南京500公里外的古城武汉,也有一件来自于校园的文物。只不过,这件文物并非来自于高校的地下,但它与高校的联系却更加紧密,因为该文物原本就来自于高校的发展历史之中。

2014年6月,经湖北省文物管理部门鉴定,177张武汉大学的建校图纸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作为近代中国建立最早的国立大学之一。武汉大学溯源于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历经传承演变,1928年定名国立武汉大学。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的这些图纸主要是1929年美国开尔斯为该校珞珈山校址完成的总设计图。

国立武汉大学定名后,确定以武昌城外东湖珞珈山一带为新校址。建筑设备委员会李四光及叶雅各,推荐时居上海的美籍人开尔斯担任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并赴上海邀请其到珞珈山考察。

根据武汉市志人物志记载,开尔斯出生于1869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对中国建筑艺术颇有研究。

实地考察后,开尔斯认为这一带山丘坡缓且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依山而建可节省地基及石料,于是赞同以珞珈山为校址。1929年3月,开尔斯开始勘测规划,半年后完成了总设计图。10月,建筑设备委员会正式聘他为新校舍建筑工程师,同时通过总设计图。

根据设计图,珞珈校园建筑布局呈现因山就势、组团变化有序的显著特点。在自由式总体布局的基础上,利用山体山势、地形地貌,依据“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原则,精心布置建筑群。整个校园在自由的格局中又有严格规整的片段,体现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重的先进办学理念。

2005年11月,武大112周年校庆之际,武大早期建筑结构工程师拉伯汗·莱文斯比尔的儿子,美国工程院院士、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奥斯特夫·莱文斯比尔,将父子珍藏70年的150多幅武汉大学早期建筑群结构图纸,以及一张建筑群即将竣工时的全景照片,亲手交给了时任武大校长刘经南。

莱文斯比尔的父亲曾参与主持设计武大早期建筑群,后来去了澳大利亚。这批图纸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和平年代里又先后“周游”多个国家,却一直保存完好。它们折射着时代的变迁,也见证着延续几代的国际友谊。父亲1984年去世后,莱文斯比尔收藏了这些图纸,并一直想找机会送给武大。经双方多年努力,终于获得联系。

至于图纸的主要设计者开尔斯,他在应邀筹建武大时已有60岁左右。1930年5月(即武汉大学理学院动工前一个月),他在上海病倒。在两年生病期间,开尔斯仍坚持工作。时任校长王世杰每次到上海看望,均见其病房里摆满武大校舍的设计图纸。

开尔斯去世时间不详,但他留下的图纸,记载着他与武大的点滴,也是“中国最美大学”的雏形。

链接

在网络上,对于曾出土过古墓的高校,网友们有一个别称——古墓派。近些年,校园“古墓派”的名单正在不断扩大,除了以上提到的几所高校外,这一名单上的高校还有很多——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在修建房屋时,发现五座墓地。经鉴定,为清康熙年间权臣索额图大女儿的陵墓,该墓被

专家命名为“黑舍里氏墓”。1986年8月,广州大学校园内发掘出3座东晋砖室墓,出土铜器、青釉器等文物数十件。

2001年,西安邮电学院在新校区建设中,发现古墓葬600多座,其中80%以上都是秦墓。

2003年,华南师范大学发掘出两座千年陵墓,分别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高祖刘岩墓和南

汉烈宗刘隐墓德陵,如今被并称为“南汉二陵”。

2003年,广东药科大学发掘出清代古炮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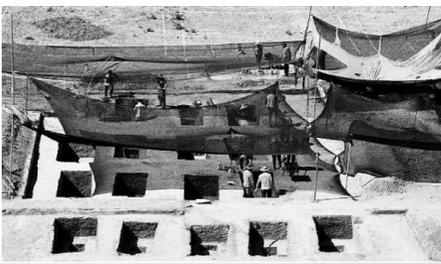
2004年,西安财经学院新校区建设中,发现大型秦墓,并出土一件珍贵的“六马鞍车”。

2012年,南京林业大学校园内发现明朝中期的古墓。墓穴石碑显示出墓主的身份:南

京锦衣卫指挥金事徐君叙妻恭人周氏之墓。

2014年,郑州大学西亚斯学院校园内发现大型秦墓区,共发掘出古墓120余座。除汉代和宋代砖墓各一座外,其余均为春秋战国墓葬。

2016年11月,陕西师范大学校内挖掘出了一座古墓,墓主人初步判定为唐朝宰相贾耽。



清华校园95座古墓发掘现场